

创富史



民国大买办

讲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
特殊群体不光彩的发迹史

他们是洋行雇员又是独立商人
他们是游走于中西间“发洋财”的人
他们是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代理人

方明 / 著



 团结出版社

创富史

民国大买办

方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富史 / 方明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26-5865-3

I. ①创… II. ①方… III. ①企业家—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4483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开

印 张: 19.5

字 数: 295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8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865-3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笔者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公司的办公楼被称为“写字楼”？为撰写这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笔者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当年在洋行供职的员工被称为“写字”，高级员工则被称为“大写”。也就是说，“写字楼”这个据称是从港台传入的称谓，颇有些历史的厚重感，乃至还有点殖民地的痕迹。

所谓“洋行”，实际上就是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公司。中国清朝以前是没有所谓的公司的，买卖人的经营场所通常被称作“店”“铺”“栈”“庄”“楼”“肆”，被称作“行”的也不少。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公司也是做买卖，而且又是洋人主事，所以中国人就称它为“洋行”。

而“买办”一词，如果牵强地比照，则类似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中方经理。但那时的买办不仅替外国老板打工，更是打着洋大人的招牌给自己赚钱。他们圆滑机敏，狡黠善变，无孔不入，胆大妄为。只要给洋大人干个几年、十几年，自己也就腰缠万贯了。这一点，是和今天外企的中方经理不可同日而语的。

买办亦称“康白度”（葡萄牙文 comprador），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最早是指英国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则是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雇用的中国经理，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当年的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

双重身份。他们作为洋行雇员，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又可以在中国经营商业、置产购地。

买办这个行当自清末诞生之日起，即饱受诟病。后世对买办的评价也是大起大落，甚至南辕北辙。

起初，国人极其蔑视替洋人做事的买办群体，称他们为“二毛子”或“洋奴”。林则徐则干脆说：“买办等人，本系汉奸。”早期研究清末民初经济现象的学者，对买办亦多无正面评价。

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现代理念的变化，学者们对买办有了新的认识。

经济学家聂好春近年在《买办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通过大量论证，得出四个结论：“买办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建设者和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者”“买办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买办是商界精英和早期经济现代化运动的主干力量”“买办是近代商会的中坚”。

买办诞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末民初，“乱世出枭雄”，不仅在政界如此，商界也是一样。因此他们发家或崛起的过程跌宕起伏、波谲云诡，充满了危机和机遇，更是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性。乃至笔者在搜集资料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为这些百余年前的商界鬼才闻所未闻的攫取财富的手段惊诧不已！

当然，当年的买办，与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他们超前的经营理念，他们为人处世的谋略，也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参照价值！

故此，本书选择了20余位有代表性的洋行买办，将他们的特殊经历整理出来，奉献给商界的朋友们，以及对那段往事有兴趣的读者。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翻云覆雨的超级政治买办虞洽卿 / 001

从一个赤脚走进大上海学徒的乡下孩子，到“东方巴黎”这座大都市最大的商人，他经历了波谲云诡的崛起历程。他不仅经营着航运、地产、银行等业务，更是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蒋介石的“提款机”。他还是个爱国者，去世前给抗战捐献了 1000 两黄金。

第二章 “洋行之王”和它的买办 / 021

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的列车正在欧洲大地上滚滚向前。此时的英国已经跃升为西方世界的头号强国，伦敦已经成为全球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大英帝国的臣民把他们的理念带到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同时，又在每一个角落榨取着每一个铜板。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对外虽然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实质上已经是外强中干，因为腐败正日甚一日地侵蚀着它的肌体。而这衰败的中国，却有着庞大的市场和无限的机遇。唐廷枢和梁炎卿等大买办正是“乱世出枭雄”的产物。

第三章 煤炭买办、“德国贵族”冯·高星桥 / 035

造土枪土炮起家的他，靠着德国的“恩公”韩纳根，成了天津卫最大的煤炭巨商。为奖励他为日耳曼帝国做出的贡献，德皇赐给他“冯”的贵族称号，使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他投资建造的“劝业场”一时成为天津这座大城的标志性建筑。

第四章 无处不在的礼和洋行和它无所不用其极的买办 / 058

很难想象，一家原本只经营缝衣针的小公司，发展到后来，竟然开始涉猎军工、机械、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行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包揽了国民政府部队的武器装备。之所以有这样的的发展，除了洋行大班的运作，更是和这家公司无所不用其极的大买办韩登堂、胡包水、王铭槐、米禄斋等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买办也由此给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

第五章 美最时洋行的日耳曼大班和中国买办 / 079

美最时洋行为清末民初汉口最庞大的经营组织，业务范围涉及航运、地产、发电、皮革、蛋业、桐油、酒业、烟叶、粮食等，几乎没有美最时洋行不插手的业务。而它的买办王伯年父子则是该洋行赢得巨额利润的最主要推手。王伯年去世时，中国各城市的德国洋行竟然都为之降了半旗。

第六章 步步为营的美孚洋行买办 / 094

当时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孚要想将自己的“洋油”在中国取代点灯的“土油”，便不得不依赖中国的本土人士。丁慎安就是帮助美孚公司在中国站住脚并大发其财的关键人物。他棋高一着，有着异于常人的宣传、设点、推销的策略，并有着一整套笼络中国员工的手段。美孚洋行老板对他赞赏有加。

第七章 聚福洋行和强华公司的巨贾买办 / 103

黄家在四川开办了几十年的“天字号”商行，一向经营日用小商品，虽然也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但自从傍上了法国的“聚福洋行”，更是大发其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家包揽了川江航运的黄金水道。黄家的掌门人左右逢源，在法国人、中国官僚之间游刃有余，成就了自己家族的庞大家业。

第八章 太古洋行的三代掌门人 / 116

自莫氏家族于1870年出任崛起于华南的英商太古洋行远东总行首任买办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香港太古总行取消买办制度为止，莫藻泉、莫干生、莫应桂三代相继，担任太古总行的买办凡60余年，使该公司成为一尊不倒翁。直到现在，莫氏家族的侄孙辈在香港太古公司服务的仍有多人。

第九章 军火买办巨头雍剑秋 / 141

通晓几国外语的雍剑秋借助义和团的兴起，结识了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华的使节和军事首领，并与当时中国北方的各路军阀都有深交，以致他后来联手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在国内大肆贩卖军火时，如鱼得水，一路畅通。发财后，他大量购进房地产，在北戴河，有一条路叫“剑秋路”。

第十章 靠木材起家的达来洋行买办阮渭泾 / 166

美国人罗伯特·达来的远东木材公司达来洋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在中国的木材市场一手遮天。但要维持在中国的经营优势，不得不依赖中国买办。他先后用过数位买办，均不满意，直到启用了阮渭泾才使得他如鱼得水。这家公司竟然在中国大陆一直维持到1952年。

第十一章 华北的汽车巨头公懋洋行买办 / 177

公懋洋行在中国专做美国福特、克莱斯勒汽车和其他品牌汽车零配件的生意。在中国仅仅开办了30余年，便大赚特赚。除了他们适应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笼络了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外，洋行的买办谭寿保可谓功不可没。

第十二章 投靠日本的买办刁氏 / 190

刁峻霄原本就有外语的底子，起初是在意大利的公司做事，后来又经营了一家发网公司，曾经占到了国内发网市场近一半的份额。但他真正发达，是进入日本洋行充当买办以后。凡是人们能想到的业务，几乎没有他不涉及的。尤其是在他投靠日本人后，狠狠地发了一笔战争财。

第十三章 汉口地产大亨刘歆生 / 199

汉口城能有今天的规模，应该说刘歆生功不可没。尽管他是个靠着洋人崛起的买办，但他围湖筑堤，买进了当年汉口近一半的土地，将常年水患不断的汉口建成了一座大城。英国女皇特恩准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马路，至今这里还是汉口最为繁华的地段。

第十四章 永兴洋行买办严逸文自述 / 210

永兴洋行在天津的法商洋行中曾经是最大的一家，业务波及颜料庄、墨灰厂、青砖厂、红砖厂、农场、养鸭场、织布厂、织毯厂、榨油厂等。自称为“买办科班出身”的严逸文几乎熟知洋行的一切潜规则。他的回忆揭示了洋行从进货、打开市场、销售到钻营官场、偷漏税的种种手段。

第十五章 三起三落的王氏家族 / 227

王铭槐起初在上海商业大亨叶澄衷所开的老顺记五金行学生意，后来逐步成为叶的亲信。此时李鸿章正向外国大量购买军火，他便通过李鸿章的密友、上海巨商严筱舫的关系，当上了专营进口机器和军火生意的德商泰来洋行买办，继而又当上了华俄道胜银行的津行买办，从而迅速地获取了大量财富。

第十六章 “借船出海”的买办高少洲 / 235

兴隆洋行是天津的一家德国洋行，开始时仅仅是推销德国的缝衣针、颜料和杂货。但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买卖越做越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跻身天津各大洋行之列。这主要得力于买办高少洲，他的管理方法是封建方式与资本主义方式相结合的独裁管理。常常是小施韬略，便赢得巨额利润。

第十七章 精明过人的正金银行买办魏氏 / 248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在中国前后凡46年。魏信臣充当该行买办36年，其子魏伯刚接着又干了10年。父子两代的经历与该行相始终，他们是该行在中国兴衰的一面镜子。他们拉拢贿赂、暗度陈仓、借力打力，无所不用其极。

第十八章 影子洋行和皮包买办 / 261

“皮包洋行”，又称影子洋行，是指那些仅靠一个手提包就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洋行。这些外国人初来时两手空空，在租界的庇护下见利就干，无孔不入，一旦折本赔钱就走了一走了事。与其他买办不同的是，这些精明过人的皮包洋行买办常常玩不过洋人，被他们坑得血本无归。

附一：买办的“大本营”天津卫 / 269

附二：亦官亦商的上海买办 / 287

后 记 / 299

翻云覆雨的超级政治买办虞洽卿

进城学生意的“赤脚财神”

1882年秋天，上海的瑞康颜料号走进来一个乡下孩子。他穿一身土布衣服，赤着脚，手上却拎着一双显然是新做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老板忍着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虽然土气，但一双眼睛还是透出几分灵气，加之介绍人的面子，就收下他当了学徒。

此人便是后来在商界和政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佬，甚至成了蒋中正的引路人的大名鼎鼎的虞洽卿。

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人称“阿德哥”，1867年生于宁波镇海县的龙山乡。他的父亲开了一爿小杂货店，但中年早逝，虞洽卿便和寡母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因无钱上学，15岁这年，辗转托人介绍，进了上海那家颜料号当学徒。

临行的时候，母亲一针一线给他做了一双布鞋，并且一再嘱咐他在店里要勤俭小心，博取师傅欢心。到了上海，虞洽卿舍不得穿那双新鞋，就赤着脚走进店门。后来发了财，有人称他“赤脚财神”。他自己也经常说起



虞洽卿故居天叙堂

这件事，甚至引以为荣。

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一个从乡下来的学徒当然只能望“洋”兴叹，自惭形秽，但也刺激了他日后要发达的欲望。

一次，颜料店老板在西餐厅请两位德国商行的买办吃饭，叫他跟去侍候。他见那两位买办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让他意识到洋场中买办之“高贵”，便立志要替洋人服务，做一个所谓“高等华人”。

凭着他年少聪慧，心灵手巧，并且时刻记着母亲的临别训言，果然深得老板的欢心，未满师就被提升为跑街。凭借这个机会，他得以与上海商界的名人经常接触，几年之中便在上海颜料行业中崭露头角。除在买卖上赚取佣金外，他有时自己也囤买一些颜料，做得十分顺手。每天晚上他还抽空到青年会去学英文，暗暗地为自己打进洋行做准备。

1894年，有一家做进出口颜料生意的德国商人的鲁麟洋行，因牌子已经做得有些知名度了，就想物色一个有经验的华人充当“开路先锋”。虞洽卿托族人虞香山把自己介绍到这家洋行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洽卿本来就熟悉颜料业务，因而做得颇有成绩，不久就被提升为买办。

鲁麟洋行除进口颜料外，还经营西药、五金、军装等，出口则有大豆、桐油、丝、茶等。虞洽卿在进口方面赚取佣金10%，出口方面赚取佣金20%。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9年，赚了一笔钱，买进了闸北的一处房屋，一跃而成为富翁了。

庚子年以后，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家纷纷在上海开设银行，发行钞票。1903年，虞洽卿36岁时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一年之后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

他利用上海商人的崇洋心理，大力推行荷兰银行钞票的发行，从中获取手续费。但虞洽卿在上海金融界的信用却不太好，自任荷兰银行买办以来，他利用该银行的名义开发远期本票，换取现金，套取利息，并独资创设惠通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

虞洽卿有着复杂的人生轨迹，从晚清到民国，他参与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早在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就有不俗的表现。四明公所为宁波人创办，以家乡四明山为名，是一个类似于同乡会的组织，

深得宁波人的支持。

这年，法租界公董局倚仗特权，以筑路为名，强行征收并派兵拆除四明公所围墙。年轻气盛的虞洽卿与同乡前辈奋起反抗，并鼓动洗衣工人罢工。这件事让虞洽卿声名鹊起，获得乡梓士人的信任，被选为四明公所会董。



虞洽卿早年与家人合影

1905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让虞洽卿在上海挣足了面子。

这年，有个广东女人黎黄氏，带着丫鬟数人，取道上海回四川原籍。她的丈夫曾在四川任知府。而巡捕房却说黎黄氏是贩卖人口的案犯，把她拘捕了。审讯此案时，外国陪审员咬定黎黄氏是个人口贩子，主张把她连同丫鬟押进大牢。

中国审判官关炯之则称，黎黄氏乃是“朝廷命妇”，家中养丫鬟是清朝法律所许可的，并说租界没有女监，男女无法混押。

外国陪审官从来说一是一，专横跋扈，便大骂中国人是野蛮民族。这一番话立即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公愤！随之与巡捕发生冲突，放火烧了巡捕房，英方则实行武力镇压。随后，英、美租界的中国商人全体罢市。租界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张皇失措。

代表商界出面与英方交涉的虞洽卿致电清政府，直言“华官尚被侮辱，若不据理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表示了对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在斗争中，有些工商界人士希望息事宁人，唯有虞洽卿义无反顾。他每日召集各界人士在寓所开会，商讨斗争方略。他还动员受雇于外国人的华籍职工离职、租界的华人巡捕罢岗，迫使英租界当局最终让步。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闹公堂案”。

接着，虞洽卿又出面与上海道台袁海观一起，挨家挨户劝告各商店开门复业，一场风波这才得以平息。这样一来，虞洽卿不仅给上海的商人和

市民留下了好印象，为租界当局也算是立了功，原本对这场骚乱束手无策的外国人对他也愈加刮目相看了。

事后，为了争取租界华人的权利，虞洽卿还发起成立了华商体操会。这个所谓的“体操会”实际上就是商会的一支武装，虞洽卿自任会长。自此，上海商界华人有了自己的枪杆子。1907年，华商体操会正式加入公共租界万国商团。

在这些事件中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充分显现才干的虞洽卿一时名声大噪，渐成沪上妇孺皆知的大闻人。

手眼通天的“政治商人”

在20世纪初动荡不安的时局里，为了寻求稳定的商业环境，商人阶层不得不寻求政治上的庇护，虞洽卿也是如此。他应时而变，虽然一再言称“在商言商，置身度外”，但是他的政治情结很浓，从未放弃与不同时期的政权和权贵人物之间的联系。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虞洽卿持同情态度，并参与其间。他曾向陈其美提供经费，还在英租界六马路成立了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场所，并竭力为民军筹饷。

革命党人在上海起事后，虞洽卿赶往苏州，以垫借100万两银子为条件，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为上海局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1912年，孙中山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发行公债，虞洽卿不仅自己大量购买，还动员其他宁波商人认购。

然而时隔不久，虞洽卿的政治态度开始改变，前后判若两人。

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孙中山等人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当陈其美攻打上海制造局时，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商会却发出公函，表示“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亦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

虞洽卿的言下之意是，不管是非如何，一概反对动武用兵，其立场明显偏向袁世凯。

当年7月，作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又致电浙江都督朱瑞，要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便有意集资前去犒劳军队“消其异志”。对此，国民党人甚为不满，曾想在他家放置炸弹杀掉他。他听到了风声，吓得不轻，赶快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商人，“并无党见”，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的态度再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在《申报》上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他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充实业。等到袁世凯公开称帝，他反袁的态度愈加明显。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

他任理事长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每月还为东南一带的革命党人提供经费。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虞洽卿提出“缩小范围，单独对英”的主张，并组成“五卅事件委员会”，把工作重心放在抵制英货、提倡国货、筹款维持罢工等事务上，为运动的展开做出了一些努力。

与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相比，虞洽卿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最为密切，也是最重要的。出于利益驱动，虞洽卿对蒋介石一直持积极态度，关系非同一般。

他们初次相见沪军都督陈其美处，再次相见是在陈其美遇害后祭奠的灵堂上，第三次则是蒋介石随孙中山到上海和虞洽卿商谈创办交易所为革命筹集资金的时候。虞洽卿虽与蒋三次见面都是急匆匆的，但蒋介石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

虞洽卿是有政治头脑的，他在投资经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人的感情投资，他曾三次施恩于蒋介石。

1920年秋，蒋介石持孙中山的亲笔信到上海找到虞洽卿。虞二话没说，就把他安排在交易所，在经纪人陈果夫的旗下做助理经纪人。但是蒋不善经纪，加之陈果夫乃陈其美之侄，而蒋与陈其美是拜把兄弟，他岂能屈就

于小辈之下？不久，两人生隙，蒋甩手而去。

蒋介石一时无事可做，但他又耐不住寂寞，希望虞洽卿能再帮他一把，想投到青帮大佬黄金荣的门下。虞洽卿看中蒋的政治潜力，便亲自充当说客。凭借他的面子，黄金荣破例应允，连入帮的费用也没要。

蒋介石入帮后，并未如他所愿。郁郁不得志的他狂嫖滥赌，寻花问柳。黄金荣知道后大怒，要按帮规处罚。虞洽卿赶忙替蒋介石说情，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假以时日，前途便会不可估量，黄金荣也就不再追究了。

1927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投桃报李，始终对虞洽卿礼遇有加。虞洽卿也多次出资援助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成了十足的“提款机”。虞洽卿与蒋介石及其政府交往多年，为了自身利益，他把“宝”全都押在老蒋身上。

虞洽卿不愧为商界翘楚，蒋介石这座政治靠山让他多有受益。当然，虞洽卿深知，不辨政治风云便无以把握商机，但过问太多则易深陷其中，为时政所害。早期，他与蒋介石及其政府走得较近，后期则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温不火。虞洽卿毕竟是商人、实业家，商场才是他的归宿。

1924年8月21日，上海总商会改选第五届会长，另一个买办、商会会长傅筱庵也是宁波人，与原任会长宋汉章展开了竞选会长的斗争。



中年的虞洽卿

这个傅筱庵是个人物。后来做了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被军统派在他身边伪装成厨师的特工暗杀了。这是后话。

傅筱庵开办有船厂，是通商银行的总经理，还是美商美兴洋行的买办，自己又在虹口开设了祥大源五金店，承办招商局的器材，并打入了盛宣怀家族，颇为盛家老四盛恩颐所信任。盛老四烟瘾极大，什么事都不管，盛家各项事业包括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实权都操在傅筱庵的手里，因此傅在上海工商界

有相当的势力。

宋汉章则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在上海金融界当然算得一个头面人物。袁世凯称帝时，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宋拒绝伪令，维持了中行钞票的信用，颇为上海金融界所称道。

这次会长改选，由于竞选双方势均力敌，结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选举时，虞洽卿在35票中以超过半数的19票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从此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一步。他把荷兰银行买办的职务交给大儿子顺恩负责，自己则抽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商会事务和政治活动。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倒了台，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段上台后，发表了“外崇国信”的宣言，承认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而虞洽卿的同乡李思浩原系安福系（段系）要角儿，在新政府中得以由财政次长升任财政总长。

段政府秘密与法国驻华公使马太尔交涉，以承认“金佛郎案”（1921年，法国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秘密协议，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法郎，即所谓的金佛郎偿付对法庚子赔款。这样一来，中国就要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消息传出，举国反对。法政府又联合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要求四国庚子赔款都以金佛郎计算，并串通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款，以胁迫中国政府。1924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为条件，交换帝国主义承认实施关税二五加税。

在段政府进行的这一卖国活动中，虞洽卿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他到北京后，即被任命为淞沪市政会办（督办为孙宝琦）。

段政府交给他的任务，是叫他回沪后，向租界当局及外国在华商会疏通，不再反对二五加税，同时疏通上海工商界，不再反对“金佛郎案”。由于段政府继续执行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人民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不承认“金佛郎案”的呼声响遍全国。

1925年，青岛、上海等地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